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　2018年7月1日　星期日　第742期 | 新民晚报 | 首席编辑:吴南瑶　视觉:戚黎明　编辑邮箱:wup@xmwb.com.cn

白岩松『我从小就向往当老师』

◆ 张英

这个月,白岩松特别忙。一是世界杯,作为专业球迷,白岩松自然不能错过,和所有球迷一样,他要熬夜看球,还要写球评。

另外一个事也是大事。他个人创办的“东西联大”第六期学员要毕业了,除了学业结业外,他也得参加这个由学生们自编自导的毕业典礼。这也是他的大事。

另外,就是他在央视的评论节目《新闻1+1》,雷打不动的,人到中年,但对做新闻节目,他还是很上心。另外,还有社会活动。这周五,他答应要去北大,参加已经退休的老同事敬一丹的新书发布活动。平时和一些老同事们见面不多,但一到老朋友出书,他还是认认真真地捧场参加。

1 “我不喜欢把童年回忆成苦”

白岩松的父母是老师,姑姑是老师,舅舅、舅妈也是老师。在上世纪的内蒙古海拉尔,教师是一份不错的工作,铁饭碗,工作安稳,也受人尊敬。每到逢年过节,家里总是人来人往。不同年龄的学生,成群结队,来看望白岩松的妈妈。“我从小就向往当一名老师。”白岩松说。

考广院是一个偶然。之前,白岩松的哥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。这对白岩松是一个很大的刺激,他觉得自己也不能比哥哥差,将来也要去北京上大学。

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,白岩松担心,自己和哥哥都离开了家,以后谁给母亲挑水吃呢?

白岩松八岁的时候,父亲去世了。十岁的时候,爷爷又去世了。家里只剩下母亲、哥哥和白岩松。当时,白岩松母亲的工资才7块,养活一家人。哥哥比白岩松大6岁。之前,家里都是哥哥去外面挑水,哥哥17岁的时候,去北京读大学,11岁的白岩松开始接过扁担给家里挑水吃。

多年以后,当白岩松站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台上回忆那段生活时说:“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,只是会感觉,那个时候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。”

但童年也有欢乐。“我的童年比我儿子有意思,我们跑步、藏猫、踢足球,自己做各种玩具,比如说自己做的那种能打出声的枪,爬树、挖地沟设陷阱,都干过。”

那时候他们家住的是学校宿舍,都是一排排的平房,前后左右都是老师。但在那个贫富悬殊相差不大的年代,人与人之间互相照料,邻里关系也特别好。

两个月前,白岩松和母亲去秦皇岛看望一位老人。“她是我们一个院里一套房的,是我妈妈的长辈,也是她的同事,我叫姥姥,从小看我长大的,我和我哥哥都在她家蹭过吃的,现在已经一百岁了,她和我妈妈之间的感情非常深,所以我们去北戴河看她。”

一些媒体把岩松这段往事写得很悲凉,把他描绘成一个逆境中出生的苦孩子,志向高大。白岩松不喜欢这样的描述:“我不喜欢把这种事情回忆成苦,因为我们那里都是这样的,东北压水,要用开水带一壶过去浇井,得把井上面的冰给解冻了,才能把这个水给压出来。那时候,挑水的一路上都是小孩。我觉得人活着要是有苦难的话,全扔到童年去,好承受一些。”

虽然没有父亲,但白家在当地是大家族,人多,没人敢欺负孤儿寡母。“我姥姥、舅舅、舅母,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,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。另外我发现东北这个地方比较阳性,包括它的冷也特别锻炼人。这样的经历得当成财富,任何东西看它好的一面。”

白岩松把自己能上大学归结于自律。高中时候,成绩不是特别好的白岩松,在高考阶段,靠学习方法上了大学。“我是学文科的,我把所有的历史书、地理书、语文书装订起来,然后在纸上统计出来,假如四本书一共是600页,地理书一共是722页,语文书一共是1000多页,然后再计算,我在高考前一共要看完四遍,每天必须看30页历史、地理,再做一下数学题,每天按照这个计划执行。”

1979年,白岩松的哥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。1985年,白岩松也考上了大学,这让母亲很欣慰。“这个家的态势就完全逆转了,左右邻居都觉得,我们的家就出头了,熬出来了。”

2 致敬“西南联大”坚持新闻理想

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后,白岩松也经常被学校请去开课,演讲,还担任了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、名誉教授。

从2007年起,白岩松出钱资助,在中国传媒大学启动了“子牛杯”社会调查报告征文比赛活动,鼓励支持大学生去了解社会,做社会问题调查。这个调查活动,已经变成了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常规课程,“子牛杯”已举办多届,诞生了一批“非典后遗症”等优秀论文。

在这个活动中间,已经是几所大学兼职教授的白岩松,萌发了自己办学的念想。2012年秋天,白岩松看了赵越胜的《燃灯者:忆周辅成》,顿时“热血沸腾”,马上决定启动“东西联大”。“我自己办私学,再难难得过周辅成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吗?”他在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传媒大学那里得到了支持,在老师们的推荐下,在这些学校的研究生里,选出了第一批学生。

要成为白岩松的学生,首先必须要考上北大、清华、人大、传媒大学的研究生。学生都是研究生一年级的,由这四所大学的新闻学院老师推荐,白岩松面试选拔,才能够入选。

之所以命名“东西联大”,就是向历史上达到中国高校教育最高峰的“西南联大”致敬。还有一个意思,是指上课的地点,一个是北大老师。考虑到学生来自北京东、西两边的高校,教室也设在东西两处,一个是北大附近的万柳山庄,一个是传媒大学的新闻学院办公楼。

为了方便学生们上课,增加学生们的交流,“东西联大”的教室是流动制,每个月上两天课,东边、西边各一次。目前,学校的专任老师只有白岩松,使用的教材和教案也是他自己准备的。

教学形式也是多样的,采用开放式课程,偶尔会请敬一丹、张立宪等业界大咖来上专项的业务课,也会带着学生去腾讯网编辑部、《读库》编辑部上实践课。

“东西联大”不收学费,也没有教材费,白岩松还要自掏腰包,管学生们的伙食。每次上完课,就是请大家吃饭。饭桌,也是流动课堂,既谈新闻业务,也谈生活。他喜欢这样的形式,像是自己回到了传统的书院教学。

在传媒大学上课用的教室,是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办公室里。这间3楼的办公室,曾经是白岩松当年上大学时老师曹璐的办公室。三十年后,同样的办公室,老师变成了白岩松。

望着十一个研究生年轻的脸,白岩松上课的时候,偶尔会恍惚,看见当年的自己和同学上课的情景。

白岩松对“东西联大”的规划很长远。“原来我打算两年招一届,招了这批孩子半年之后,我很兴奋,改一年招一届。你想想,等我到70岁的时候,我有两百多个耳提面命、‘私塾’里走出来的学生,我相信他们会很优秀。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,这是一个有趣的尝试。”

在这个班上,班长每个月换一次,通过投票决定,整理当月的课程资料,负责和同学们沟通交流,和白岩松沟通;每个月的新闻实践训练课也是大家提出,最后投票决定,进行实施。就连吃饭时靠近白岩松身边的座位,也是用扑克牌抽签决定。

3 一个人所能抵达的高度和持久力

“东西联大”每年从北大、清华、人大、传媒大学四所高校的研究生中招生。白岩松有约在先:“我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就是,‘东西联大’不是一个找工作的地方。但你如果认真读完这两年,在我这里学到了真本事,就一定有竞争力,你的工作应该不会太差。”

白岩松走到今天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,只是当时的苦现在回想起来,全变成了甜。本来他的单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,在实习的半年里,白岩松的诚恳和热情给带他的老师和部门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在他准备报到前,他突然收到通知,去北京郊区的周口店基层机关劳动锻炼一年。

白岩松在周口店乡政府呆了整整一年,无所事事。“那时我很沮丧,因为看不到希望。一年就看了两本《红楼梦》,那是我识字以来看书最少的一年。”

一年后,他回了广电部,被重新分配到《中国广播报》工作。去报到的第一天,白岩松到单位对面的南礼士路的兴达书店,买了一本人民大学出版社的《报纸编辑》。很快,他成为那张报纸最勤奋的编辑、记者。除了写新闻外,他也写诗写散文。“我来自内蒙古,一个外地人,没有亲人,也没有任何背景,只能靠自己努力地工作。”

每一届的毕业生,在毕业典礼上都能够得到一张毕业证。毕业证红印章“东西联大”旁,白岩松的签名身份是“校长”。还有一句话:“与其抱怨,不如改变;想要改变,马上行动”。

“‘东西联大’是一个试验田,不是一所大学,它更像是中国传统式的书院,教书育人,我的课堂上,厚度、见识、逻辑、人生趣味,对人生、人性的了解,专业的长久定力,是我要教授的内容,这些是最重要的东西,决定一个人所能抵达的高度和持久力。”白岩松说。

在摄影师的镜头里,白岩松立场坚定,眼神刚毅。“我们的沮丧来自于:我们总有一个终极理想,世界美好。我不信人类有终极的理想实现的那一天,心肝的问题解决了,将来就是胃和肠子问题,再将来是前列腺问题,人类永无止歇,就这么向前走。我看懂了这一点,所以我没那么多沮丧。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忧心忡忡,他是啄木鸟,在哪一个时代里面都是如此。”

他很满意自己的身体,还能踢球,也没有肚子。“我觉得人的身体挺有趣的,比如说血压有点高,你不用药品的,用体育训练,正常的作息,也能够把它弄下去。”

现在,除了踢球、游泳、跑步,去健身房练力量、练柔韧撑撑腿,他还经常提醒自己,管住自己的嘴巴,只吃八分饱,注意节食,保持身体健康。“我想看看我踢球能到多大岁数,虽然我膝盖的问题比过去大多了,但我还能够踢球,你还要知道我身边多少人早就离开球场了。”

不上镜的时候,他经常会在家里,点上一炷香,茉莉花或者玫瑰花味道的,在阳光下看书,听着音乐。

走在街上,他经常觉得现在的人走路太快,行色匆匆,顾不上看周围的了,也无了看路边的花开花落。这让他想起在国外的一次游历:一条高速公路商店两边山谷,那里开满了花,路边的路牌写着,慢点走,好好欣赏这美吧!

白岩松说,自己后半辈子就是40岁写过的那几个字:“捍卫常识,建设理性,寻找信仰。”